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關稅政策對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產業關聯的影響研究

玄春姬* 祝成山**

| 목 차 |

- | | |
|---------------|------------|
| I. 引言与文獻綜述 | IV. 實証結果分析 |
| II. 理論分析与研究假設 | V. 結論与啓示 |
| III. 數據、變量与模型 | |

| 논문요약 |

特朗普于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任第47任美國總統，特朗普2.0時期正式開始，全球範圍的“關稅戰”再次打響。本文從區域價值鏈的角度出發，通過亞洲開發引開的多區域投入產出表，運用投入產出分析法，研究2007-2023年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的產業關聯變化，進一步論証特朗普再一次高舉關稅政策發起“關稅戰”，會對亞太地區的區域價值鏈造成哪些影響。實証結果證明，特朗普2.0時期的關稅政策相比于特朗普1.0時期的關稅政策的實施效果會更加小，即很難達到特朗普預期的在國際產業鏈上“去中國化”以及推動美國製造業回流的目的，并且會增加美國消費者的無謂損失。

▪ 關鍵字：關稅政策，區域價值鏈，產業關聯，亞太地區，電氣和光學設備

*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副教授

** 吉林大學東北亞學院本科生

I.引言与文獻綜述

1. 引言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第47任總統，正式開啓自己的美國總統第二任期。在關稅政策方面，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相同的是：仍然延續“美國優先”原則，通過提高關稅來推動製造業回流；繼續加強產業鏈上的“去中國化”，特朗普再次上台后的第16天，也就是2月4日，宣布對所有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并取消800美元以下商品的小額豁免，2月27日宣布于3月4日進一步追加10%，使對華平均稅率遠超第一任期的針對性措施，企圖遏制中國經濟發展。同時，特朗普2.0時代的關稅政策也呈現出与特朗普1.0時代不同的特征，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關稅打擊的對象從針對中國一個國家到更大範圍，特朗普上台后簽署行政令，對進口自美國傳統盟友的墨西哥、加拿大兩國的產品加征25%的關稅，將于3月4日如期正式生效，并取消了對阿根廷、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和英國等國家或地區的豁免和免稅配額，并宣布決定征收“對等關稅”，即讓美國与貿易伙伴彼此征收的關稅稅率相等，并稱將考慮對使用增值稅制度的國家加征關稅，進一步將關稅戰擴大到更大範圍，對全球價值鏈產生了沖擊，也使亞太地區的區域價值鏈面臨着重構的壓力，給世界經濟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但是，由于特朗普上一任期的“脫鉤”壓力，中國也在國際價值鏈重構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全球價值鏈的結構已經与特朗普上一任期時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2022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生效，標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落地，充分體現了各方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信心和決心，使東亞地區形成了更加緊密的區域價值鏈網絡，加強了亞太地區經濟體之間的產業關聯，RCEP正式生效第一年，中國對RCEP貿易伙伴的出口同比增長17.5%，高于整體增速7個百分點¹⁾，取得積極進展。另一方面，美國上一任總統小約瑟夫·羅比內特·拜登提出“印太經濟框架”(IPEF)，試圖構建排除中國的“平行供應鏈”，來實現美國國際供應鏈上的“去中國化”。這兩個區域經

1) 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濟組織的成立使得亞太地區內出現產業“雙軌化”趨勢，即中國主導的區域價值鏈和美國主導的區域價值鏈，兩個區域經濟組織的成立都加速中低端製造業向東南亞轉移，使得亞太地區的區域價值鏈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重構，也使得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產業鏈發生了與美國高關稅壁壘相適應的調整。因此，研究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對亞太地區區域價值鏈的影響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些經濟體在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下投入產出的流向具有怎樣的特点，用以評估特朗普2.0時代的關稅政策的實施效果與影響，為中國提供重要的經濟戰略參考。

2. 文獻綜述

由于特朗普政府將關稅政策作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大利器，國內學者對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關稅政策從各個國家的角度已經進行了比較完整的研究。在美日貿易關係方面，(李暢然2020)從雙層博弈理論的角度論述了特朗普政府如何通過雙邊關稅談判以及中美貿易戰的壓力促成與日本的貿易談判。(熊軍陽2022)通過對特朗普政府在經濟上“加征關稅”引發貿易戰、產業“去中國化”等舉措的論述，證明“特朗普主義”促動中美“脫鉤”。(王英杰2021)則是全面闡述並分析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貿易政策，重點闡述了2016-2020年中美關稅政策的發展變化。(金香丹等2019)的研究指出，特朗普政府執政後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給中日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但也使得中日韓三國為了低於出口下降風險、緩解與美貿易談判壓力、維護區域一體化整體收益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加深，使中日韓FTA談判出現新的機遇。(孫藝鵬2021)提出，在“美國優先”原則下，特朗普政府對歐頻頻加征關稅造成美歐直接經濟損失，破壞雙邊貿易投資。(曹廷2019)闡述特朗普如何利用關稅政策逼迫墨西哥政府在非法移民問題上讓步。(裴氏云英2018)通過對東盟與美國的貿易數據分析，論述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東盟-美國貿易的影響。(朱福林2025)則是總結回顧特朗普1.0沖擊以及進行特朗普2.0前瞻，並通過價值鏈角度審視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的形成，發現這種逆差實際上很大程度是由東亞地區集體創造的，只是由于分工角色原因反映在中美經常賬戶上。

而關於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對區域價值鏈產業關聯的影響研究仍然較少，大多是關於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如何影響美國製造業回流的研究。由于特朗

普政府的“美國優先”原則中一大重要內容就是通過提高關稅來推動製造業回流，因此國內外對關稅政策對製造業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王韻2020)從製造業回流指數的角度判斷美國製造業回流情況，研究發現美國製造業並沒有在高關稅政策下實現大幅回流，並深入分析了美國製造業回流與關稅政策間的邏輯沖突。(葛鮮云2023)則是基於斷點回歸分析論證美國的高關稅政策是否導致了其製造業產品進口的貿易轉移，研究表明美國關稅加征行為造成的貿易轉移效應遠遠小於貿易抑制效應。也有一些學者從貿易差額的角度去分析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戰”對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張宇寧2021)運用投入產出分析對中美各行業的前後向關聯效應進行測度分析，並與中美貿易戰進行結合，研究發現中美貿易戰使中國未來產業規模的擴大對全球經濟的拉動作用將有所增強而美國將有所減弱。(Caroline Freund 2024)通過比較受關稅影響和未受關稅影響產品的貿易變化，分析美國對華加征關稅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並指出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正在被從大型發展中國家進口的貨物所取代，這些國家在某種產品上具有顯性比較優勢。但是在戰略性產業中，取代中國的國家往往深度融入中國的供應鏈，並且從中國的進口增長更快，因此美國雖然想通過關稅政策與中國貿易“直接脫鉤”，但是在供應鏈上仍然“間接依賴”中國。(Fajgelbaum Pablo等2022)結合李嘉圖-阿明頓貿易模型分析美國對華加征關稅對不同關稅彈性國家的影響，發現越南、墨西哥等國收益明顯，而加拿大等反應較弱。但是總的來說，缺少對美國關稅稅率的直接研究。

基於以上思考，本文整理了美國的加稅清單，具體到HTS8位編碼，計算出美國對不同經濟體具體產業商品的年均稅率，並與產業關聯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從“關稅差”的角度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關稅政策效果展開分析。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於：第一，通過數據支撐來闡述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之間產業關聯的動態變化，展示亞太地區區域價值鏈的結構變化，為亞太地區區域價值鏈的學術研究提供基础性貢獻。並且通過研究美國關稅政策對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之間產業關聯的影響，為經濟學領域關於關稅與產業關聯的理論發展做出理論貢獻。第二，響應中國政府對國際經濟研究的時代要求，拓展區域價值鏈相關問題的研究領域，為中國提供重要的經濟戰略參考。

II.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基于產業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的理論，本文針對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給亞太地區產業關聯的影響提出以下假設：

1. 特朗普政府的加征關稅所導致的產業關聯的變化主要受被征關稅國家之間的“關稅差”影響

由于美國對華加征關稅，中國向美國輸出的商品在美國的價格升高，導致美國市場對中國商品的需求減少，間接增加了整條產業鏈的生產成本，即關稅成本。當中國通過第三國家進行轉口貿易時所增加的運輸成本低于中國直接向美國輸出商品的關稅成本時，中國會積極開展轉口貿易，從而減少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給中美貿易所帶來的抑制效應。在此基礎上，如果將產業鏈下游產業直接轉移到勞動力成本相對廉價的國家或地區，能進一步節省運輸成本和勞動力成本，提高轉口貿易的效率。轉口貿易和產業轉移的產生是由于美國對不同國家征收的關稅之間存在差異，導致通過第三國家轉口貿易以及產業轉移的成本比加征關稅后直接出口所增加的成本要低，可以減少美國對華加征關稅所帶來的貿易抑制效應，但是如果美國對兩個國家的商品都征收相同的關稅，則轉口貿易只會增加運輸成本，產業轉移也只節省了一部分勞動力成本，缺少轉口貿易和產業轉移的動力。因此，我們進一步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1：美國對兩個經濟體的同種商品征收的關稅差額越大，則越能增大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產業關聯。

III. 數據、變量與模型

1. 數據與變量

基于本文的假設H1：美國對兩個經濟體的同種商品征收的關稅差額越大，

則越能增大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產業關聯。本文將解釋變量設置為美國對另外兩個經濟體的同種商品征收的關稅差額，並且由表1可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海關統計的中國向美國出口額中，中國向美國輸出的產品中出口額最大的產品為產品編號為第85章的產品，其所對應的ADB-MRIO中的產業部門為C14部門(電氣和光學設備)，因此我們將C14部門作為分析對象，研究美國的關稅政策對中國C14部門的中間產品出口有何影響。美國對各個經濟體的C14部門產品所征收的關稅稅率由作者通過總稅額/總進口額得出，其中總稅額由作者對美國協調關稅表HTS8位編碼中的第85和第90章的所有商品的整理計算得出，總進口額由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官方數據整理得到。

<表1> 2015-2023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額最多的前三個產品分類

年份	產品編號及分類名稱	出口額 (單位：人民幣)
2015	(85)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录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591,802,854,498
	(84) 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零件	523,352,776,256
	(94)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燈具及照明裝置；發光標志、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180,275,408,160
2016	(85)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录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614,920,869,553
	(84) 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零件	523,487,883,601
	(94)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燈具及照明裝置；發光標志、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180,285,887,563
2017	(85)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录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722,326,028,052
	(84) 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零件	620,805,732,000
	(94)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燈具及照明裝置；發光標志、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197,923,703,549

年份	產品編號及分類名稱	出口額 (單位：人民幣)
2018	(85)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录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791,300,928,554
	(86) 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零件	677,655,108,186
	(94)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灯具及照明裝置；發光標志、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219,350,957,213
2019	(85)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录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732,992,381,370
	(84) 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零件	595,441,456,371
	(94)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灯具及照明裝置；發光標志、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189,606,560,050
2020	(85)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录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770,838,644,724
	(84) 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零件	658,189,606,740
	(94)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灯具及照明裝置；發光標志、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203,521,492,577
2021	(85)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录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858,821,008,397
	(84) 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零件	731,769,086,523
	(94)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灯具及照明裝置；發光標志、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245,512,334,307

年份	產品編号及分類名称	出口額 (單位：人民幣)
2022	(85)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聲机、電視圖像、聲音的录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942,181,543,285
	(84) 核反應堆、鍋爐、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	724,532,567,756
	(95) 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品及其零件、附件	238,804,030,291
2023	(85)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聲机、電視圖像、聲音的录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	876,103,743,894
	(84) 核反應堆、鍋爐、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	623,613,728,970
	(94)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制品；未列名灯具及照明裝置；發光標志、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215,005,039,189

▪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海關統計數據。

由于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導致中國的轉口貿易和產業轉移，也就是中國向美國的中間產品出口轉移到其他經濟體，因本文選取中國C14部門對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的前向關聯效應作為被解釋變量。前向關聯效應由作者經投入產出方法計算得出，初始數據庫是亞洲開發銀行的多區域投入產出表(ADB-MRIO)。

本模型的控制變量為、、、。其中，參考(陳啓斐2022)的研究方法，將跨國投資作為控制變量來控制正常全球技術擴散對產業關聯的影響，其中表示上游經濟體即中國的對外投資淨流出占GDP的比重，表示下游經濟體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淨流入占GDP的比重；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考慮到經濟增長速度也可能會導致本國低端產業向外轉移，同時也可能促進下游國家承接轉移來的產業，因此本文用GDP的增長率作為控制變量來控制經濟增長對產業關聯變化的影響，為上游經濟體即中國的GDP增長率，為下游經濟體的GDP增長率；最后，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產業關聯可能受全球價值鏈的嵌入程度的影響，而非美國關稅的影響，因此我們將全球價值鏈貿易參與指數的自然對數作為控制變量，來控制全球價值鏈嵌入程度對產業關聯的影響。則来源于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價值鏈實驗室的UIBE GVC數據庫，其他控制變量均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

2. 模型設定

根據假設H1，為了驗證特朗普關稅政策對產業關聯的影響，且由於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主要影響是中國向美國的中間產品出口會向第三國轉移，也就是中國與第三國家的前向關聯效應，因此本文從中國的視角，分析中國C14部門對其他經濟體的前向關聯效應是否顯著受關稅差額的影響。基於此，本文設定如下回歸模型：

$$= + + + (3)$$

其中， i 表示中國的C14部門的下游經濟體， t 表示時間；被解釋變量即為上一章計算的中國C14部門在 t 年對其他經濟體的前向關聯效應；解釋變量即美國對中國與經濟體的C14部門產品征收關稅的差額；為控制變量，為誤差項；為核心系數，用於衡量關稅差額對於產業關聯的影響程度。

3. 基準回歸結果

本文基於表2選取了亞太區域內與美國進出口貿易往來比較密切的五個亞太地區國家，分別為日本、韓國、越南、墨西哥、加拿大，來進行實証分析。

<表2> 美國2007-2023年進出口貿易總額前16名國家或地區(單位：萬億美元)

國家	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	外貿總額
加拿大	4.85	5.47	10.32
中國	1.92	7.39	9.32
墨西哥	3.83	5.19	9.02
日本	1.15	2.28	3.43
德國	0.94	1.96	2.89
韓國	0.81	1.20	2.01
英國	0.98	0.95	1.94
法國	0.55	0.79	1.34

國家	出口總額	進口總額	外貿總額
中國台灣	0.49	0.84	1.33
印度	0.45	0.81	1.26
荷蘭	0.78	0.40	1.18
巴西	0.65	0.50	1.15
意大利	0.32	0.78	1.10
瑞士	0.39	0.62	1.01
愛爾蘭	0.17	0.82	0.99
越南	0.12	0.81	0.93

▪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數據庫。

基于以上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表3> 關稅差額對中國C14部門前向關聯效應的全樣本回歸結果

	全樣本
<i>tariff</i>	0.0209757 (1.16)
\cap	0.0015131 (0.45)
\cap	-0.4095835*** (-8.32)
<i>master</i>	0.0008718 (1.60)
<i>target</i>	0.00021 (0.59)
<i>lnGVCsr</i>	0.0020749 (1.46)
Constant	0.0117867 (1.39)

▪ “*”表示10%的顯著性水平，“**”表示5%的顯著性水平，“***”表示1%的顯著性水平，括号內為t值。

由表3可知，相對關稅與中國C14部門的前向關聯效應呈正相關的關係，即相對關稅越大，中國C14部門與這些亞太地區經濟體的前向關聯效應越大，從現實來看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對華加征關稅加強了中國C14與亞太其他國家的前向關聯效應，即中國C14部門的上游部門對其他國家的下游部門推動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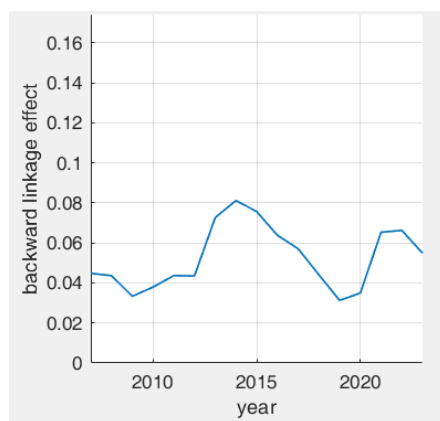
增強，与我們在本文前面分析的結果相同，但是并不顯著，因此考慮到可能是不同國家之間存在異質性，因此我們進行異質性分析。

4. 異質性分析

爲了檢驗特朗普關稅政策對中國C14部門前向關聯效應的異質性，我們先從中國C14部門前向關聯效應的時間趨勢圖來進行可視化分析。

首先來看美國C14部門對中國的后向關聯效應變化趨勢，由圖1可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C14部門對中國的后向關聯效應一直處于減少的趨勢，直到中美在2020年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才有所回升。2020年開始，USTR公布第17至20輪豁免清單，涉及机械部件、電子元件等，旨在緩解協議執行壓力，并且受全球新冠疫情影響，美國單獨發布新冠醫療產品關稅豁免清單，包括呼吸機零部件、防護服原料等，体现特殊時期政策靈活性，直至拜登政府開始執政，對352項中國商品(如自行車、醫療設備)實施關稅豁免，中美之間的“關稅戰”有所放緩，導致美國C14部門對中國的后向關聯效應有所回升。主要是由于特朗普對中國向美國輸出的產品實施高關稅壁壘，阻礙了中國上游企業的中間產品向美國下游企業的流動，因此美國在價值鏈上作爲下游企業的后向關聯效應才會一直呈減少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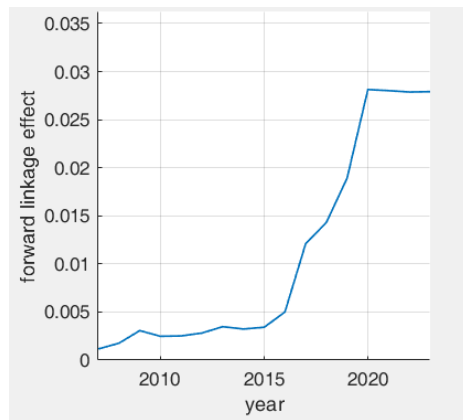
<圖1> 美國C14部門對中國的后向關聯效應



▪ 作者通過ADB-MRIO計算得出結果，根據計算結果自制。

那么中國的中間產品的流向在美國受阻后的流向是哪里呢？由圖2可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伴隨着美國C14部門對中國的后向關聯效應逐漸減弱，中國C14部門對越南的前向關聯效應顯著增強，即中國C14部門由于流向美國受阻，轉而大量流向越南，与越南的下游企業關聯效應顯著增加，而2020年之后增速減緩甚至略有下降，可能是由于中美在2020年簽署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后中美之間中間產品流動有所恢復，与圖1中美國C14對中國的后向關聯效應變化趨勢的時間点剛好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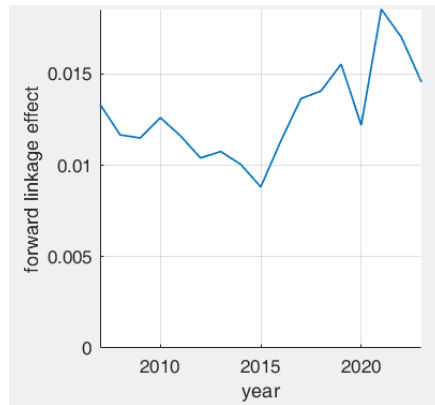
<圖2> 中國C14部門對越南的前向關聯效應



▪ 作者通過ADB-MRIO計算得出結果，根據計算結果自制。

无獨有偶，中國与墨西哥的產業關聯效應也呈現出与越南相類似的變化，由圖3可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中國C14部門對墨西哥的前向關聯效應也呈不斷增強的趨勢，而2020年略有下降，可能是受到2020年美加墨三國協定正式生效的影響。但也可以看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中國上游企業的中間產品流向墨西哥的趨勢增強，加強了中國和墨西哥之間的產業關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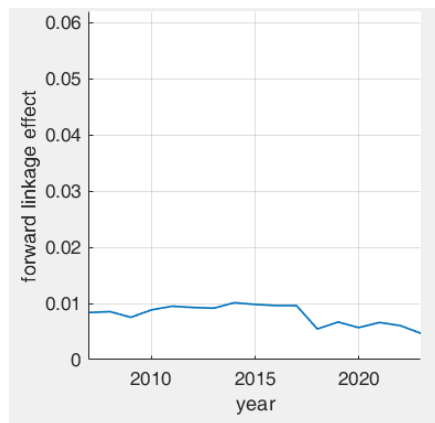
<圖3> 中國C14部門對墨西哥的前向關聯效應



▪ 作者通過ADB-MRIO計算得出結果，根據計算結果自制。

反觀加拿大，從圖4可以看出，中國C14部門對加拿大的前向關聯效應並沒有太明顯的變化，可能是由于加拿大與越南、墨西哥的關稅彈性不同，這也與(Fajgelbaum Pablo等2022)結合李嘉圖-阿明頓貿易模型分析美國對華加征關稅對不同關稅彈性國家的影響，發現越南、墨西哥等國收益明顯，而加拿大等反應較弱的結果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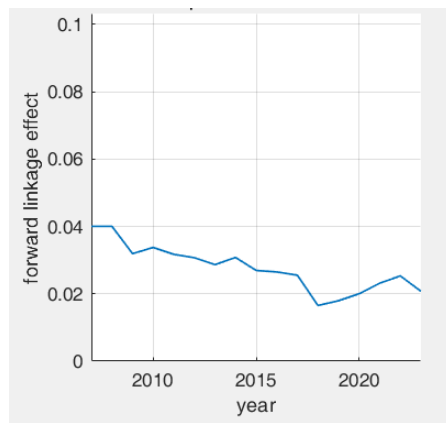
<圖4> 中國C14部門對加拿大的前向關聯效應



▪ 作者通過ADB-MRIO計算得出結果，根據計算結果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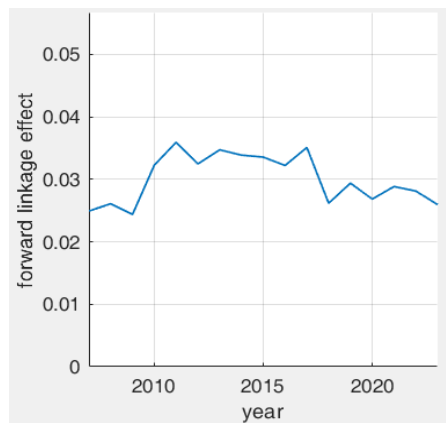
同樣，由圖5和圖6中國C14部門對日本和韓國的前向產業關聯變化也并不明顯，沒有顯著受到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的影響，即中國C14部門向日本和韓國全產業的中間產品輸出對日本和韓國的全產業生產的推動效應並沒有由于特朗普對華加征關稅而顯著增強。

<圖5> 中國C14部門對日本的前向關聯效應



▪ 作者通過ADB-MRIO計算得出結果，根據計算結果自制。

<圖6> 中國C14部門對韓國的前向關聯效應



▪ 作者通過ADB-MRIO計算得出結果，根據計算結果自制。

綜上所述，特朗普第一任期對華加征關稅導致中國向美國輸出的中間產品流動受阻，體現在C14部門則是從中國輸出的中間產品轉而流向越南和墨西哥，顯著加強了中國與越南和墨西哥的產業關聯，促使亞太地區的區域價值鏈發生了一定程度的重构，而這些中間產品在越南和墨西哥進行下游產業的組裝，最終再以最終產品的形式出口到美國，來減弱美國對華高關稅政策的負面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貿易機會。

基於以上可視化分析，我們也發現，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對華加征關稅對不同經濟體的產業關聯影響是顯著不同的，因此我們認為美國關稅政策對於不同經濟體的產業關聯的影響存在差異性，基於此，本節對不同經濟體進行異質性分析。按國家分組回歸的結果如下表：

<表4> 相對關稅對中國C14部門前向關聯效應的分組回歸結果

	的係數	控制變量
墨西哥	0.0308386**** (4.73)	控制
越南	0.1110072**** (6.89)	控制
加拿大	-0.0073567 (-1.66)	控制
日本	-0.0524158 (-1.31)	控制
韓國	0.0009946 (0.05)	控制

▪ “*”表示10%的顯著性水平，“**”表示5%的顯著性水平，“***”表示1%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為t值。

從表4中可以發現，相對關稅對中國C14部門對加拿大、日本的前向關聯效應可能呈現負相關的影響，但是並不顯著，而對中國C14部門對韓國的前向關聯效應呈正相關的影響，但是係數的絕對值很小，且並不顯著，這也與我們上一章可視化分析中圖4、圖5和圖6的結果相同，即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對中國C14部門對加拿大、日本、韓國的前向關聯效應影響並不顯著。

同樣由表4可知，相對關稅對中國C14部門對墨西哥的前向關聯效應呈顯著正相關，即美國對中國C14部門商品征收的關稅與美國對墨西哥C14部門征收的關稅之間差距越大，中國C14部門對墨西哥的前向關聯效應越強，且這種關係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同樣的，相對關稅對中國C14部門對越南的前向關聯效應呈顯著正相關，即美國對中國C14部門商品征收的關稅與美國對越南C14部門征收的關稅之間差距越大，中國C14部門對越南的前向關聯效應越強，且這種關係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

1. 多重共線性檢驗

爲了防止控制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對所有自變量的方差膨脹系數進行檢驗，對加拿大、日本、韓國、墨西哥、越南的VIF檢驗結果如下：

<表5> VIF檢驗結果

變量	VIF	1/VIF
<i>tariff</i>	1.84	0.543882
∩	1.63	0.613454
∩	2.02	0.495479
<i>master</i>	3.16	0.316132
<i>target</i>	1.31	0.764089
<i>lnGVCsr</i>	1.61	0.620764
平均VIF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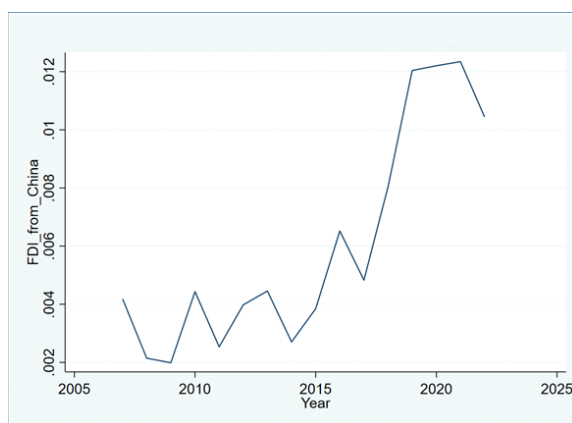
由表5可知，大部分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都接近1，只有有的方差膨脹因子稍大，存在輕度多重共線性問題，但VIF仍小於5，因此可以忽略此變量的多重共線性問題，而整體來看，兩個模型的平均方差膨脹因子均遠小於10，容忍度均大於0.1，因此可以認爲模型中的所有變量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IV.實証結果分析

本文基于中國對美國輸出商品總額最大的商品，即HTS2位編碼為85和90的兩類商品所對應的C14部門，結合本文第五章整理計算的前向關聯效應和美國官方關稅稅率，時間跨度為2007-2023年，研究美國對不同國家征收不同的關稅，即產生相對關稅或關稅差額，會如何影響兩個國家的產業關聯，通過實証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特朗普的在第一任期對華加征關稅的政策，對中國C14部門對越南的前向關聯效應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從表4來看，美國對中國和越南征收關稅的差額對中國C14部門對越南的前向關聯效應具有顯著的影響，且系數是中國C14部門對墨西哥的3.6倍。而且從中國對越南的直接投資流量來看，中國母公司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大了對越南子公司的直接投資。

<圖7> 中國對越南直接投資額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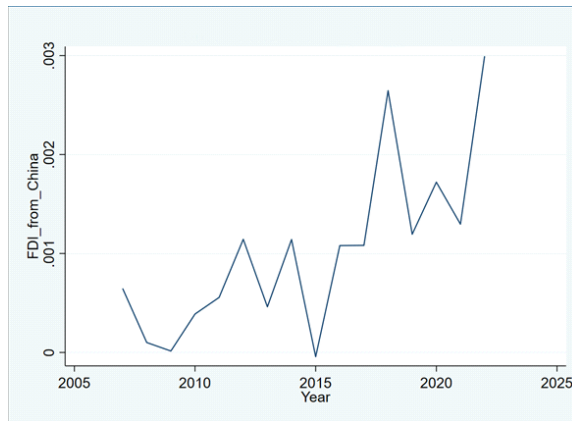


▪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由作者用Statal7繪制。

由圖7可以看出，特朗普對華加征關稅加大了中國母公司對越南子公司的直接投資，結合前文對產業關聯的分析，本文推測中國C14部門對越南的前向關聯效應加強是由于特朗普對華加征關稅而導致了中國企業向越南的轉移，從而加強了兩國之間的前向產業關聯效應，即中國的上游企業對越南的下游企業生產的推動作用增強。

第二，特朗普的在第一任期對華加征關稅的政策，對中國C14部門對墨西哥的前向關聯效應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但是影響系數較小，即美國對中國和墨西哥征收關稅的差額對中國C14部門對墨西哥的前向關聯效應影響效果較小。

<圖8> 中國對墨西哥直接投資額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



▪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由作者用Stata17繪制。

由圖8可以看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對華加征關稅也導致中國對墨西哥的直接投資增加，同樣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國的下游企業向墨西哥的轉移，但是這種產業轉移並沒有很大程度地影響中國C14部門上游企業對墨西哥下游企業的產業關聯效應，即中國上游企業的投入對墨西哥下游企業的產出推動作用比較小。基于此結果，本文推測中國對墨西哥的產業轉移可能更多集中于其他產業部門。

第三，從越南和墨西哥兩國對比來看，針對中國C14部門來說，中國向越南的產業轉移要更多一些，而且對兩國產業關聯效應影響較大，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中國企業向越南轉移下游公司的運輸成本要比向墨西哥轉移的運輸成本要低。因此，美國對兩國征收的關稅差額對中國C14部門對越南的前向關聯效應的影響效果要大于對中國C14部門對墨西哥的前向關聯效應的影響效果。

最后，就目前的數據來看，美國對華征收的關稅與對其他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如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家征收的關稅差額，對中國C14部門的前向關聯效應影響並不顯著，而根据(Fajgelbaum Pablo等2022)的研究，可能是由于

這些國家的關稅彈性与越南和墨西哥不同。

V. 結論与啓示

1. 研究結論

本文先通過亞洲開發銀行2024年更新的多區域投入產出表(ADB-MRIO)的2007年至2023年62个国家35个行業的面板數據，整理計算得出亞太區域主要國家之間的前向產業關聯效應，并對中國向美國輸出的主要產品部門——C14部門的前向關聯效應与美國對中國与對第三國家的C14部門產品所征收的關稅差額進行實証分析，驗證關稅差額是否會影響中國C14部門的前向產業關聯效應，來反映對中國轉口貿易和產業轉移的影響。

研究發現：美國征收的關稅差額對中國C14部門的前向關聯效應的影響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較大的差异性：(1)美國對中國C14部門產品征收的關稅与對越南、墨西哥C14部門產品征收的關稅差額對中國C14与越南、墨西哥的前向關聯效應影響顯著，而且呈現顯著的正相關；(2)美國對兩國征收的關稅差額對中國C14部門對越南的前向關聯效應的影響效果要大于對中國C14部門對墨西哥的前向關聯效應的影響效果。(3)美國對中國C14部門產品征收的關稅与對日本、韓國、加拿大C14部門產品征收的關稅差額對中國C14与這三个國家的前向關聯效應影響并不顯著。

但是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對亞洲開發銀行的多區域投入產出表(ADB-MRIO)的35个產業部門都進行異質性分析，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所頒布的加稅清單并非包含所有部門的產品，因此本文僅對受特朗普關稅政策影響最大的C14部門進行了實証分析，根据其影響机制，C14部門的實証結果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在特朗普政府加稅清單中加稅情況相類似的產業部門，但是并非适用于所有產業部門，如C32(教育)、C34(其他社區、社會和个人服務)等其產品沒有大幅列于加稅清單中的特殊部門，以及C35(有就業人口的私人家庭)這類因國家規定問題可能為空值的部門。

2. 研究啓示

鑒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得到以下几点啓示：

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加征關稅政策會對中國C14部門与越南、墨西哥的產業關聯產生顯著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會比第一任期要小。在本文的實証分析中發現，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對華加征關稅顯著加強了中國C14部門對越南和墨西哥的前向關聯效應，促進了中國C14部門的下游企業向越南和墨西哥的產業轉移，從而減小美國對華加征關稅所帶來的關稅成本的影響。但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不僅對中國加征關稅，也對其他國家實行不同程度的加征關稅，因此縮小了中國与其他國家的相對關稅()，而且由于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國已經進行了產業轉移，因此本次特朗普團隊加征關稅的政策效果可能會比第一任期要小，即不會太大程度影響中國与亞太地區其他經濟体的產業關聯。

第二，對於中國与亞太地區區域价值鏈中的其他經濟体的產業關聯效應而言，特朗普加征關稅政策並不會顯著影響中國与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家或地區的產業關聯效應，可能是由于這些發達國家或地區並不具備越南和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向這些地區轉移下游產業並不能很好地抵消美國加征關稅所帶來的關稅成本，加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也對這些經濟体提高關稅，縮小了相對關稅，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關稅政策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世界經濟的短期動蕩，對全球供應鏈造成一定沖擊，但是並不會對亞太地區的區域价值鏈造成太大的沖擊，也不會很大程度上影響亞太地區主要經濟体之間的產業關聯效應。

最后，(王韻2020)通過對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實行加征關稅政策之后的美國製造業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實施后製造業並未實現大幅回流。因此，特朗普政府加征關稅的各种政策效果均難達到預期，只有美國消費者成爲最終的關稅承擔者。

基于以上啓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 优化出口結構，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

雖然由本文研究結果來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關稅政策並不會對亞太地區的

產業關聯效應造成顯著影響，但是從需求曲線的角度來看，加征關稅政策一定會增加進口商品在美國市場的价格，從而導致美國市場需求減少，而特朗普發動更大範圍的關稅戰則給中國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創造了更多貿易機會，無論是中國還是韓國都應該抓住機遇，擴大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往來，積極參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CPTPP)等區域經濟合作，不僅要對傳統市場繼續深耕，比如擴大奢侈品、高端醫療設備等“非敏感品類”進口以平衡貿易摩擦壓力，同時也要加強對新興市場的滲透，以減少美國加征關稅的“貿易抑制效應”，以應對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發動的更大範圍的“關稅戰”給世界貿易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強全球價值鏈的韌性。

2) 堅持中美積極對話，和平解決貿易摩擦問題

從本文研究結果來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關稅政策，無論是促進製造業回流美國，還是對華經濟發展實施打壓，都可能很難達到預期效果，只會徒增美國國內消費者的負擔。而且從本文的研究結果來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中國將下游企業轉移到其他國家，也體現出美國雖然想通過關稅政策與中國貿易“直接脫鉤”，但是在供應鏈上仍然“間接依賴”中國。因此，中美兩國不應該放棄合作協商機制，應通過和平的方式進行對話溝通，避免對全球供應鏈的巨大沖擊，從而找到一個雙方互利的合作模式。

3) 加強中韓雙邊合作機制，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

雖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只針對中國加征關稅，但是在其第二任期內將對更大範圍的國家實施“對等關稅”，韓國也不可避免地面臨美國關稅提高的問題，加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內擬取消拜登政府承諾的半導體產業補貼(如三星、SK海力士在美投資的千億美元項目)，轉而通過高關稅推動產業鏈回流美國，以及將防衛費與關稅問題捆綁等壓迫政策，可能會對韓國的對美貿易產生一定的阻礙。因此，中韓兩國應該加強雙邊合作機制，作為被美國加征關稅的同一陣營伙伴，借助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TA)第二階段的協商契機，積極構建雙邊經

濟合作机制，減少貿易壁壘，以最大程度減少美國加征關稅對兩國的“貿易抑制效應”，加強兩國半導體產業鏈的垂直整合，促進技術互補分工，促進兩國產業互補與產業升級，增強區域價值鏈的穩定性。

| 參考文獻 |

1. 論文及專著

- 朱福林.(2025).中美經貿關係：特朗普1.0沖擊與特朗普2.0前瞻.財經問題研究,(02),3-16.doi:10.19654/j.cnki.cjwtyj.2025.02.001.
- Caroline Freund,Aaditya Mattoo,Alen Mulabdic & Michele Ruta.(2024).Is US trade policy reshaping global supply chai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52,104011-104011.
- 葛鮮云.(2023).美國加征關稅導致了其製造業產品進口的貿易轉移嗎?(碩士學位論文,江西理工大學).碩士
- 熊軍陽.(2022).“特朗普主義”促動中美“脫鉤”問題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鄭州大學).碩士
- Fajgelbaum Pablo,Goldberg Pinelopi,Kennedy Patrick,Khandelwal Amit & Taglioni Daria.(2022).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Global Reallocations.The World Bank,
- 張宇宇 & 龐軍.(2021).中美貿易戰、產業關聯與碳減排——基于HS六位編碼和MRIO模型的研究.國際經貿探索,37(08),4-19.doi:10.13687/j.cnki.gijmts.2021.08.001.
- 王英杰.(2021).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華僑大學).碩士
- 孫藝鵬.(2021).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對美歐關係的影響(碩士學位論文,山東大學).碩士
- 李暢然.(2020).雙層博弈視角下的特朗普政府時期美日貿易談判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遼寧大學).碩士
- 王韻.(2020).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能否吸引製造業回歸美國.華北金融,(04),29-37.
- 金香丹 & 廉曉梅.(2019).特朗普政府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沖擊：中日韓FTA談判的機遇與挑戰.東北亞論壇,28(05),92-101+128.doi:10.13654/j.cnki.naf.2019.05.007.
- 曹廷.(2019).美國揮舞關稅大棒,成功逼迫墨西哥就范.世界知識,(13),52-53.
- 裴氏云英(BUI THI VAN ANH).(2018).特朗普政府對外貿易政策及其對東盟—美國貿易的影響(碩士學位論文,武漢大學).碩士

| 논문투고일 : 2025년 04월 13일 |

| 논문심사일 : 2025년 05월 09일 |

| 게재 확정일 : 2025년 05월 26일 |

| ABSTRACT |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rump's tariff policy in his second term on the industrial linkages of major econom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hunji, XUAN

(Associate professor, North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of Jilin University.)

Chengshan, ZHU

(Undergraduate, College of Northeast Asia, Jilin University.)

Trump was sworn in as the 47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January 20, 2025, and the Trump 2.0 period officially began, and the global "tariff war" began ag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value chai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es in industrial linkages of major econom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rom 2007 to 2023 through the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 introduced by Asian development, and uses the input-output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changes in the industrial linkages of major econom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rom 2007 to 2023, and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impact of Trump's "tariff war" on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tariff policy in the Trump 2.0 period will be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Trump 1.0 period, that is,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e-siniciz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return of the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pected by Trump, and it will increase the unnecessary losses of American consumers.

- Keywords: Donald Trump, industrial linkages, tariff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lectrical and optical equipment